

从徽宗初年“覆奏”“同奏”之争 看北宋的宰辅奏事*

王化雨

〔关键词〕 北宋;徽宗;宰辅;奏事;皇权

〔摘要〕 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知枢密院事曾布与左仆射章惇,就两府覆奏公事的方式产生了分歧。曾布为了能与向太后密谈,力主分班覆奏,章惇则力主合班覆奏,以求削弱曾布的优势。两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争中利用了分班奏事、合班奏事、留身奏事、进熟状等多种进奏渠道。最终,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曾布压倒章惇,获得了胜利。透过这次政争,我们可以对北宋君主与宰辅之间沟通渠道的运行实态,形成立体细致的了解。此外,此事亦提示我们,个人层面的君主、宰辅关系,与体制层面的皇权、相权关系,既有关联,亦有参差。君相之间既有矛盾,更有互补。相比备受关注的君相之争,两者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形成“组合”,更值得重视。

宋代的君臣交流,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就此问题,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①。然既有研究在进行论述时,常倾向于将若干不同事例,从其各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抽离出来,加以概括分析。这种做法,虽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形成较为全面的认知,但不免存在割裂史实的隐患,既不利于我们切实理解一幕幕君臣交流场景背后的真正动因,也不利于我们考察君臣交流活动究竟是如何与政治领域中的其他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因此,在业已形成的概论式研究的基础上,仍有必要做细致的个案分析。

北宋后期的重臣曾布,在所撰政治日记《曾公遗录》中,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他在哲宗、徽宗两朝“在政府奏对之事”^②,尤其是对徽宗初年的帘前“覆奏”仪制之争,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这为我们进行个案分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以下,笔者拟以《曾公遗录》的记载为中心^③,就覆奏仪制一事剖析北宋的宰辅奏对,以求推进相关研究。

一 徽宗即位之初的最高决策集团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十二日深夜,宋哲宗病逝。向太后、章惇、曾布等人在哲宗灵柩前经过一番争斗后,最终确定以哲宗之弟、18岁的端王赵佶入继大统,是为徽宗^④。随着新君登位,北宋政治翻开了新的一页。

北宋的皇权体制较前代更为成熟,这为徽宗行使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徽宗个人的劣势也比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11JJJD770004)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12JZD013)。

① 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王化雨:《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年;周佳:《北宋仁宗朝的日常政务处理》(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

② 缪荃孙:《曾公遗录·跋》,曾布撰,程郁点校:《曾公遗录》,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③ 平田茂树在《由〈曾公遗录〉所见宋代宰相的政治空间》(邓小南、杨果、罗家祥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20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64页)一文中,对《曾公遗录》所记载的君臣沟通渠道有所分析,可参看。

④ 关于徽宗登位的经过,可参见张邦炜:《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较明显:首先,无论血缘亲疏、年龄排行,还是个人声望,他在哲宗诸弟中都不占优势。对于他继承帝位,当时很多人并不心服。朱太妃、蔡王赵似、宰相章惇等“内外异意之人”的存在,对其构成了隐患^①。其次,由于并非法定储君,徽宗在即位之前从未受过任何“为君之道”的训练,与实际政务相当疏离,在政治能力上有不小的欠缺^②。徽宗刚一即位,便要求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表明他对自己的劣势亦很清楚。

将徽宗扶上皇位的向太后,被徽宗赞誉为“聪明,自神宗时已与闻政事”^③,不乏政治经验。作为神宗正妻,她对神宗的政策有一定的解释权,在当时一切以神宗之法为旨归的背景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然身为女主,向氏难免会受到制度与观念的约束。同时,由于她个性相对温和,一些政治人物对她并不很敬畏。当她在哲宗灵前问及谁当即位时,宰相章惇便敢于“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④。单凭她一人之力,亦不足以左右政局。

徽宗初年,两府共有四名宰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知枢密院事曾布。四人之中,章惇势力最大。他在哲宗朝独相六年,广有奥援,颇为时人所忌惮。然拥立赵似失败,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了极大的阴影。蔡卞也是哲宗朝的资深宰执,势力略逊于章惇。但为人阴鸷,较章惇更有心计。许将资历较浅、地位较低,政治影响力远不及章、蔡。宰辅与向太后讨论继位人选时,许将无所开陈,只能“唯唯”^⑤,就是例证。曾布的政见相对持平,不走极端,在士大夫中风评较好。但作为枢密院执政,他的职权范围有限,影响力无法与三省长贰尤其是章、蔡二人相敌^⑥。

上述诸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君主与宰辅的关系而言,徽宗、向太后与章惇因“定策”之争,已然势不两立。但章惇资历深、影响力大,故帝、后一时间也不得不对他表示优容。曾布在“定策”一事上支持过徽宗与向太后,然三人此前并无太深渊源,仅仅因为现实利益临时站到了同一阵线上,相互间的联系纽带尚待强化。就宰辅内部关系而言,曾布与章、蔡在哲宗朝就已成为政敌,矛盾极深^⑦。然曾布素来长袖善舞,只要有可能,也会在章、蔡中间施行拉拢、挑拨之术。章惇、蔡卞关系曾比较近密,但由于在哲宗后期出现过争执,两人之间渐生裂痕。商议新君人选时,蔡卞就没有支持章惇,而是称“在皇太后圣旨”^⑧。许将则一贯依违于众人之间。

自正月十二日徽宗即位,到二月二日哲宗“三七”的二十日中,哲宗几筵陈于福宁殿上,君臣须为先帝发哀,视朝活动暂时中止。宰辅若有事奏陈,只能于入宫吊丧之余,以临时“请对”的方式,集体面见帝、后。这段时间,君主、宰辅在召用人才等问题的讨论中,虽有一些暗斗,但整体局势波澜不惊,没有出现过于激烈的政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哲宗“丧次”的特殊背景,使得君臣在言行上不得不有所收敛;另一方面,请对的时间短、渠道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束缚住了君臣的手脚。二月二日,哲宗“三七”期满,宋廷恢复了日常的视朝奏对,君臣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政局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

二 首轮较量:“再对”与“进熟状”

按宋代仪制,每日上午皇帝会御垂拱等殿听取奏事,是为“视朝”^⑨。包括宰辅在内的官员,会按照身份、职务分为不同班次,轮番上殿。在一定程度上,班次影响着君臣交流的进程。自北宋建立始,宰辅的奏事班次便屡有变化,至元祐后期,方基本定型:“每朝,三省枢密院先同对。枢密院退待于殿

① 参见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42~258页。

② 参见刘静贞:《法古?复古?自我作古?——宋徽宗文化政策的历史观照》,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版,第447~469页。

③④⑤⑧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19、212、212、212页。

⑥ 关于徽宗即位之初的宰辅群体,可参见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44~246页。

⑦ 参见汪天顺:《章惇与曾布、蔡卞交恶及其对绍述政治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⑨ 关于宋代的视朝活动,可参见赵冬梅:《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阁门司》,《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33页。

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再上进呈,独取旨。”^①从制度规定上看,三省和枢密院拥有均等的奏事机会。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在绍圣(1094~1097年)、元符(1098~1100年)时期,相比于三省长贰,知枢密院事曾布在与君主交流方面更具优势:三省有多名长贰,奏事时,章、蔡等偃于同列在旁,发言会有所顾忌。而枢密院在大多数时间中只有曾布一人,故枢密院“再对”,往往就是曾布一人面君独对,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言献纳,甚至揭发他人“阴私”^②。徽宗即位,使曾布获得了一个扳倒章、蔡的机会,他自然要对这一优势加以充分利用。恢复视朝的当天,曾布即利用“再对”对三省进行了猛烈抨击:

陛下践阼之初,号令政事,无不深合人望。及韩忠彦等除命一出,中外翕然称诵圣德,凡此等人皆久当收召,但以三省所不悦,故未得还。若非陛下特降诏旨,令密院参议,则此等人姓名无由上达^③。

这一番言论,既做了自我标榜,又对政敌予以了丑化,体现出“再对”的价值。

对于曾布的这一优势,章惇早已心知肚明,绍圣年间就曾试图加以反制,“枢密院日得独对,惇疑布,更引(林)希同知,使察之”,但效果不佳,“希寻为布所诱,亦背惇”^④。元符元年林希被罢,枢密院重由曾布独掌,章惇对于曾布每日的“再对”更是无如之何。然而,就在徽宗宣布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之后,章惇找到了一个削弱曾布“再对”优势的办法。

向太后既垂帘听政,曾布若想达成自己的意愿,还需和太后沟通。按之前君臣讨论的结果,太后垂帘听政的方式,应以“嘉祐故事”为基本框架,即宰辅先与皇帝讨论,形成决策议案后,再到内东门小殿向太后“覆奏”^⑤。二月二日,曾布结束“再对”后,与三省宰执一起赴内东门小殿。就在奏事前,奇变陡生:

夔(章惇)遽呼尚书省礼房出札子,云:“内东门覆奏事,须同奏。”乃太常寺所定,三省、枢密院同得圣旨,依。余初失于详阅,今乃觉其为奸,盖恐余独于帘前奏事耳。余因云:“三省、枢密院同奏职事,有此故事否?”夔云:“乾兴、天圣中,丁谓欲独班奏事,众以为不可,乃故事。”余云:“此事体大,岂太常寺所可定。既不曾与同列商量,又不曾禀旨,便如此行,莫未安否?”夔云:“太常寺曾禀白。”余云:“不曾见。”左辖(蔡卞)亦云:“不曾见。”余云:“此亦不争,密院独班于帘前奏事,诚未安,然岂可不商量后便如此定。”左辖云:“须检故事须是。”^⑥

“内东门覆奏事,须同奏”之仪制,表面上是太常寺拟定,其实出自章惇之意。采用这样的覆奏方式,对章惇有两方面的益处。首先,曾布早已与章惇有矛盾,向太后因为“定策”之事也与章惇敌对。若有机会,两人必然会联手逐惇。枢密院“再对”,可为双方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秘密沟通渠道。取消枢密院帘前“再对”的权力,可使曾、向两人很难进行密谋。其次,在垂帘听政背景下,宰辅在皇帝面前所奏之事必须得到太后首肯后才能施行。曾布无法独班于帘前“覆奏”,那么纵然他能在徽宗御前“再对”,效果也势必会大受影响。章惇此举,可谓对付曾布的釜底抽薪之策。

然则章惇何以能瞒过曾布等同僚以及君主,令“内东门覆奏事,须同奏”成为事实?曾布开始说内东门同奏事,曾先由“三省、枢密院同得圣旨”,后面却又指责章惇“既不曾与同列商量,又不曾禀旨”,为何他会有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余初失于详阅”云云,表明曾有相关文书经过曾布之手,这是何种文书?曾布为何又不加详阅?要解答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宋代宰辅进奏取旨的方式做一番梳理。

宋代宰辅有三条进奏取旨的途径:“或上殿取旨、或头签札子奏闻、或入熟状。”^⑦“上殿取旨”,属于君臣之间的面对面交流,皇帝可就相关事项与宰执做仔细探讨。“取旨”时,殿上往往有多名宰执,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的意见,有时甚至会形成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某位宰辅若想蒙蔽君主和同僚,难度极大。“头签札子奏闻”涉及的事情通常比较重要,宰辅在进奏札子之前往往会聚议,君

① 叶梦得著,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页。

② 参见平田茂树:《由〈曾公遗录〉所见宋代宰相的政治空间》,邓小南、杨果、罗家祥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2010)》,第57~62页。

③④⑤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36、216~217、237~238页。

④ 陈均编,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四,绍圣四年二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0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三,元祐元年七月己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329页。

主也基本上会详阅宰辅的奏事札子,很多时候还会亲自作出批示^①。要通过“头签札子”绕开同僚,骗取圣旨,难度不小。“入熟状”则与前两者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宰辅用熟状拟进的,主要是“中书细务”^②。正因为熟状内容多无关紧要,故宰辅不会对其过多留意,常常不加审阅便径直签押。同样,熟状在进入禁中后,形式上须皇帝裁定,但由于所涉事体通常较小,实际上皇帝一般不会亲阅,画可批示亦常由尚书内省女官等人代劳。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某个宰辅将本该面奏或入札子的重要事务改用熟状拟进,便可能收到欺瞒同僚、蒙蔽皇帝之效^③。结合《曾公遗录》所记,章惇在确定“内东门覆奏事,须同奏”一事上,就是利用了“进熟状”的手段。二月十三日,许将在向徽宗解释为什么同奏事文书上会有自己的签押时称:“失于点检,只作熟事押过。”^④宋代语汇中,“熟事”可代指“熟状”,如《宋会要辑稿》载:“(中书)逐房堂后官,一人主承受批凿圣语、定押敕草,一人主点检书写熟状,呈押进入。”^⑤《宋朝事实类苑》言及于此时则曰:“堂后第一人主生事,第二人主熟事。”^⑥曾布先说“三省、枢密院同得圣旨”,后却称“既不曾与同列商量,又不曾禀旨”,并说自己“失于详阅”,也正与熟状的特点相吻合。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度上,章惇并无拟进熟状的权力。元丰五年(1082年)改制后,“入熟状”成为中书省的专职。“三省之制,中书省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小事受批降若覆请及入熟状拟进得旨者,亦以黄纸书,宣奉行讫,录送门下,为‘录黄’”^⑦。元祐以降,三省职事逐渐趋同,一些事宜须以三省或三省、枢密院集体的名义进熟状,但相关熟状仍须中书省官吏撰拟。如元祐五年(1090年)三省、枢密院集议“刑名”,议定后,由“中书刑房吏人”撰写熟状,呈押进入^⑧。徽宗初年,章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在三省中独不掌中书省事。即便太常寺在章惇的授意下拟出“同奏”仪制,上报尚书都省,章惇也必须将之转交给中书省,才能拟成熟状。中书侍郎许将作为中书省的实际执掌者(当时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一职空缺),不太可能不看详太常寺的仪制文书。

两府关于“覆奏”抑或“同奏”的争斗中,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其一,二月二日内东门小殿前,曾布、蔡卞均表示此前“不曾见”太常寺草拟的仪制,许将却不一语。其二,二月二日之后,曾布以贴文向三省长官询问此事,门下云,“不知元改因依”,尚书省称“但检坐故事回报”,中书则曰:“请问太常寺。”^⑨结合这些线索,可以判定,许将确曾看过太常寺草拟的仪制。此后他在御前所说的“失于点检,只作熟事押过”,只是推脱之词。利用“入熟状”,章惇可以瞒过仅需在熟状拟出后签押的曾布、蔡卞,却无法瞒过熟状的直接经手人许将,那他如何确保许将不会提出异议?许将知晓内情,又为何不告知同僚及君主?关键在于自绍圣时期开始,许将就对势力强横的章惇十分畏惧,不敢与之有正面冲突,“惇、卞既睽,许将凛凛畏此两人,不敢启口”^⑩。章惇能借“入熟状”弄权,体现出人事因素在权力运作中的重要性,它甚至可以使制度上的防弊制衡形同虚设。

又如前述,章惇为了确定“内东门覆奏事,须同奏”之仪制,还利用了“乾兴、天圣中,丁谓欲独班奏事,众以为不可”的所谓“故事”。宋代士大夫素来将丁谓视为“奸佞”,对于权力欲较强的章献刘太后也素有微词。乾兴(1022年)时丁谓“独见奏事”的尝试,在很多人看来,反映了这两人欲独揽大权的企图^⑪。章惇提出这一典故,目的正是要以此影射曾布的“独对”就如同当年丁谓的“独见奏事”一样,

① 参见王化雨:《宋代君主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邓小南、平田茂树、曹家齐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又,“头签札子闻奏”中的“札子”,与“夔遽呼尚书省礼房出札子”中的“札子”是名同实异的两种文书。前者是上行的奏事文书,后者则是宰辅进呈取旨后,根据圣旨制定的下行指挥[参见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第114~12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五月戊辰,第5053页。

③ 关于熟状与宋代政务运行,笔者将另文详述,今不赘。

④⑤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49、248页。

⑥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二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08页。

⑦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⑧ 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一,元丰五年四月,第504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丁巳,第10799页。

⑩ 曾布:《曾公遗录》卷八,第189~190页。按,许将与章惇的关系,可参见方诚峰:《走出新旧: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第143页。

⑪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1~350页。

是奸邪弄权之举。细观曾、章问答,二人的侧重点其实存在参差:曾布强调的是二府职事有别,章惇则着力于“独对”与否。章举出的“故事”,并不能正面因应曾的疑问,但对后者形成了不小的震慑。在新君即位、女主垂帘的敏感时期,曾布自然不愿落人以“奸邪”的口实,只能被迫承认“密院独班于帘前奏事,诚未安”。

有研究者指出,宋人一方面极为尊崇“祖宗家法”“祖宗故事”,另一方面,却常常根据现实需要,对看似神圣的“家法”“故事”加以取舍^①。章惇的做法,恰印证了这一看法。在权力运作中,“家法”“故事”能否发挥功效和发挥多大的功效,很多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自身,更有赖于政治人物如何对其加以利用。依靠熟状和祖宗故事,章惇在与曾布的首轮交锋中取得了明显优势。当日两人一番争辩后“寻催班,遂同赴帘前,先呈二府文字迄,又同呈三省文字,次同呈密院文字讫,退”^②。至此,事态发展完全符合章惇的意愿。曾布的势力本就较弱,若失去秘密进奏的机会,就更难与章惇抗衡了。曾布虽然恼怒,一时也无如之何。难道他只能坐以待毙了吗?

三 留身取旨:曾布的对策

章惇确定“内东门同奏”的手段看似高明,实则存在两处破绽:其一,名义上“同奏”仪制是经三省枢密院取旨后制定的,但实际并不代表两府的共识,也未真正获得过君主首肯。其二,章惇引用的“乾兴、天圣故事”虽然可以暂时震慑住曾布,但这又与之前两府共同认可的“嘉祐故事”有抵牾之处。缺乏真实的圣旨和确切的“故事”作为依托,“同奏”的法理依据便不坚实,“覆奏”仪制依然存在变数。

在二月二日之后的数日中,曾布在两府“同呈”时尽量避免与章惇发生正面冲突,在枢密院御前“再对”中,也仅是偶尔提及“惇无他,但每事欲争先,故多错”^③,并不对章惇做过多抨击。但下殿之后,却向礼部、太常寺发文,积极收集章惇弄权的证据。

遂下太常,答云:“蒙门下相公指挥,为故事不明,即令内中帘前同奏事,合依见奏事为定。遂改‘覆’字作‘同’字。”再问之曰:“若谓帘前同奏事,缘皇帝前亦系同奏事,岂可便以为定?”答云:“礼部两次退状令改。”遂问,礼部云:“都省批退。”^④

两府最初拟定的“嘉祐故事”,只说宰辅须“覆奏”太后,并未称应“同奏”。太常寺、礼部的回文指出,他们是在章惇的压力之下,不得已将“覆奏”改为了“同奏”。这也坐实了章惇确有私改“故事”的擅权之举。

二月十二日,曾布利用“再对”之机,将章惇“不曾与同列商量,又不曾面奏取旨,只是暗地谕太常,改覆奏事作同奏事”的情形告诉了徽宗,要求徽宗“理会”。徽宗对此十分不满,但此时既有向太后垂帘,他便无法专断,何况此事直接涉及到向太后的“礼数”,更须征求皇太后的旨意。因此,他告知曾布“禀皇太后,必有圣旨”。问题在于,该用何种方式“禀皇太后”?就此,曾布与徽宗又做了一番商议:

余云:“以有条约,不敢独禀皇太后。”上云:“留身不妨。兼此事已是自家理会得,是与三省同禀,亦不妨。”余云:“臣非不知此,然欲先禀陛下及皇太后,如何理会,方敢与三省同呈。”上云:“但留身。”余云:“臣弟肇比蒙收用,于迎阳听政之时,臣已曾曲谢。及至帘前,不敢留身,以此未曾谢皇太后,今得旨留身,即欲因而致谢。”上云:“甚好。”^⑤

对于应如何“禀皇太后”,徽宗和曾布的看法不尽相同,徽宗认为曾布既可以留身进奏,也可以与三省“同奏”,曾布则坚持必须先留身“独禀”,然后才能与三省同对。两人何以会存在这一分歧,需要辨析。又,徽宗下令“但留身”之后,曾布立即称:“臣弟肇比蒙收用,于迎阳听政之时,臣已曾曲谢。及至帘前,不敢留身,以此未曾谢皇太后,今得旨留身,即欲因而致谢。”曾布这样说用意何在?也值得推敲。

先分析前一问题。北宋制度,“宰执日同进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阁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⑥。在北宋政治史上,留身奏事最主要的功能,是宰辅用于向君主奏陈一些公开场

①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532~535页。

②③④⑤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38、241、246、247页。

⑥ 徐度撰,朱凯、姜汉椿整理:《却扫编》卷中,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50页。

合不便明言的秘密信息。真、仁之际,王曾借助留身奏事向刘太后揭发丁谓“擅移皇堂”,就是典型事例^①。在曾布和徽宗商议之际,向太后已经知道了章惇擅改“故事”之举。曾布在徽宗所说的“禀皇太后,必有圣旨”一语下作了一条小注:“闻禁中亦已知改故事矣。”^②所谓“禁中”,显然就是指向太后。另外,徽宗所说“兼此事已是自家理会得”中的“自家”,结合上下文看,也是指向太后。既然向太后已经知晓此事,似乎曾布就没有必要再留身开陈。徽宗认为“与三省同禀,亦不妨”,应缘于此。

然对于曾布而言,此时留身奏事的意义,不仅在于传递信息。“臣非不知此,然欲先禀陛下及皇太后,如何理会,方敢与三省同呈”,表明他之所以要留身,是因为他对径直与三省帘前同呈会产生何种结果心中无数,故一定要通过“独禀”来为此后的“同呈”做铺垫。结合当时的情况看,令曾布担忧的应是“同呈”时蔡、许的向背以及太后的态度。

宋代宰辅每日集体上殿奏事,名义上是向君主“进呈取旨”,实际上君臣多会就取旨之事进行详细商议,参与奏对的君主、宰辅皆有发言权^③。若曾布持“覆奏”“同奏”之事在帘前与三省同禀,那么章惇、蔡卞、许将都将加入讨论。章惇自然会坚持“同奏”。许将素来畏惧章惇,难保他不会站在章惇一边。蔡卞与章惇虽在垂帘时期已经出现了矛盾,然毕竟此二人一度曾是“死党”。更重要的是,蔡卞与曾布的矛盾也很尖锐。在哲宗几筵之前,两人暗中就有过几番交锋。如宰辅第一次帘前奏事时,蔡卞即宣称:“天下大计已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当持守。”曾布则予以反驳:“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于公议为是,孰敢以为不然?”^④两人一主“绍述”,一主持中,立场上的差异难以弥合。后来在讨论召用尚书、侍从官时,蔡卞针对曾布引韩忠彦等人回朝的建议再度发难:“只是恐有人援引诋毁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张照察。”曾布连忙为自己辩解:“同是臣子,古人有言,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亦必无此理。”^⑤“运作”掉枢密院的“再对”权力,不仅有利于章惇,对同在三省的蔡卞也不无益处。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前,蔡卞既未明确支持章惇,也未公开支持曾布。在曾、章二人皆有“故事”来佐证自己看法的情况下,蔡卞所说的“须检故事须是”显得模棱两可,令人难以判断其真实立场。许、蔡动向不明,曾布若径直与三省“同呈”,很可能会面临以一敌三的风险。

向太后又如何?在垂帘之前,曾布和向太后甚少接触,对她的了解,几乎全来自于之前二十多天奏事时的观察。而在这段时间,向太后所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谦逊”。一方面,她在奏对中往往主动将决策权下放给宰辅;另一方面,但凡涉及到自己的“礼数”,她总是要刻意加以减损。宰辅进呈“嘉祐故事”时,她的表现就是显例:

进呈嘉祐故事如前。太后云:“相公等裁定。”夔与余皆云:“须禀圣旨。”太后又云:“莫奏取官家指挥?”余云:“适皇帝再三令禀皇太后圣旨,兼此事是皇太后身分事,皇帝实难裁处。”夔亦云:“是太后面分事。”遂答云:“皇帝长成,本不须如此。只为皇帝再三坚请,故且勉从,非久便当还政,只如慈圣故事甚好。”余等皆称赞皇太后圣德谦恭,德音如此,实近世之所罕有。余云:“既得旨,不御前后殿,惟三省、密院于内东门覆奏职事,则百司皆不奏事、臣僚不上表章、生辰不建节名、不遣使契丹,皆当如慈圣故事。”……太后曰:“已知。”^⑥

向太后不仅在奏对时全盘接受了宰辅提出的方案,第二天更以手诏付中书省,称:“皇帝践祚之处,勉从勤请,非久便当退归房闼,除不御前后殿已指挥外,如回避家讳之类,并勿施行。”^⑦对“礼数”进行了裁减。看来她很清楚“女主”在宋代政治中的敏感性,因此非常注意通过谦逊之举来避揽权之嫌。但如此一来,若章惇举出“乾兴故事”以坚持“同奏”,向太后是否也会让步?对于曾布而言,亦是未知之数。

总之,对于曾布而言,当时最高决策集团中微妙的人事关系,使“同呈”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留身”成了曾布政治谋划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贸然“同呈”并无必胜把握,在“同呈”之前,他必须找机会与向氏单独接触,说服向氏坚定地支持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压服章惇等三省宰执。

众所周知,宋代存在多元化的君臣沟通渠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各渠道所能发挥的功效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别。政治人物能否在众多渠道中作出正确选择,继而对其有效利用,直接影响到他能否实现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三月,第2285页。

②④⑤⑥⑦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47、218、233、218、219页。

③ 参见王化雨:《“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自己的图谋。对此,曾布显然有着远比徽宗透彻的认识。老练政客和稚嫩君主在经验上的差距,充分地显现出来。

再分析后一问题。曾肇为曾布之弟,哲宗时因修“实录”获罪,被贬谪为地方知州。徽宗即位后,曾肇因恩赦得以召还。曾布所说“弟肇比蒙收用”,即此之谓也。曾布、曾肇既为兄弟,曾布因肇召还而向太后谢恩,便属个人私事。按照宋代惯例,宰辅若有私事,不应在“同呈”等进奏公事的场合向君主进言,只能留身进奏。因此,当某个宰辅希望借助留身奏事攻击政敌,又不愿引起对方察觉时,往往会以私事为掩饰。如乾兴元年(1022年)，“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丁)谓,而未得间。一日,语同列曰:‘曾无子,将以弟之子为后,明日朝退,当留白此。’谓不疑曾有异志也”^①。

从表面上看,曾布似乎与王曾一样,欲借“曲谢”曾肇事麻痹章惇。然而元符三年(1100年)的章惇,与乾兴元年的丁谓不同。曾布向太常寺、礼部取索文字时,章惇已经有所警觉,“夔见密院取索甚急,故先进呈(相关文字)”^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曾布以“曲谢”曾肇事为掩饰,也很难瞒过章惇。那么,他为何又要有此一说呢?关键之处在于,此时徽宗名义上虽拥有最高权力,但个人威望较为有限。在之前的二十余日中,徽宗的圣旨并未完全得到宰辅们的严格执行。曾布自己就有过不遵圣旨的举动:正月十六日,徽宗明令枢密院具三五名可任两省押班和带御器械的宦官名单进呈,曾布却只肯提名自己认可的张承鑑、麦文炳,最后徽宗也只能任用这两人^③。仅凭少年天子一句“但留身”是否就真能突破“帘前不得独对”的仪制?是否就能使章惇不加阻拦?实属未知之数。因此,在已经“得旨”的情况下,曾布还须找一个令人无法批驳的理由,保证自己能成功“独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曲谢”曾肇事无疑是最佳的借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肇得蒙“收用”,正是出自章惇的提议。正月十二日,两府聚议“叙用、牵复、量移”之人名单时,章惇主动提出“子开(即曾肇)、致远(即叶涛,曾布之甥婿)皆当复职”^④。他之所以主张收用政敌亲属,应该是为了在同列面前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不料日后曾布会借此留身奏事,与向太后商议对付自己的策略。政治风云的诡谲变化,常常会造就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此事便是其一。

利用徽宗的圣旨和自己制造的借口,当天内东门“覆奏”结束后,曾布顺利留身。他首先向向太后禀告了相关情况:

余云:“臣独当密院,非敢于帘前独班奏事,但故事如此。(章惇)下不与同列议,上不禀旨,便阴谕有司改此一字,在臣不敢计较,然于皇太后礼数有所贬损,不敢不陈。适得圣旨云:‘但留身必有圣旨。’”

在切入话题时,曾布首先申明自己“不敢计较”,同时强调自己留身进奏全是出自徽宗的主张,表现得小心翼翼。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与向太后单独接触。

向太后的回应却十分干脆:“他怎生敢将上来?怕这里捉下。”看来之前一直以“谦逊”形象示人的向太后,内心深处并不愿意任由他人“贬损”自己的“礼数”。明了太后的立场后,曾布信心大增,随即对章惇进行了猛烈攻击:

章惇怕臣于帘前独对,不知何意?况惇于定策之际,已是失言,不知恐惧,又于皇太后礼数上辄行更改,一无所畏惧,太大胆。

“太大胆”之说正中向太后下怀:

先帝养成他大胆,只是疲赖。当时于帘前议立先帝,以此一向大胆,无所畏惧。他初作相时,是蓝从熙去宣召。从熙是瑞圣阁中人,说与惇云:“此命皇太妃之力甚多,将来何以报答?”昨先帝病危,瑞圣曾云:“只十二哥是姐姐肚皮里出来,你立取十二哥即稳便。”先帝自此气不复语。

向太后在曾布面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哲宗和章惇的不满,又毫无顾忌地对曾布讲述了蓝从熙、朱太妃(瑞圣)与章惇的关系,以及朱太妃妄图拥立赵似(十二哥)等宫禁秘闻。她对曾布的倚信显露无遗。在向氏的“鼓励”下,两人的对话越发深入:

余云:“此语惇何以得知?”太母云:“必是从熙。”余云:“若如此,罪尤不可胜诛。”太母云:“诛戮有余,事在里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三月,第2285页。

②③④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46~247、227、216页。

……”太母语声甚低,余附耳于帘前,然不晓,所记才半耳。兼多再稟乃详晓。

向太后“语声甚低”,体现出“尤不可胜诛”、“诛戮有余”之类言论在政治上是何等的出格。而曾布“附耳于帘前”的一幕,也非常值得玩味。这一行为,完全违背礼仪规范,在普通场合中,绝不可能出现。向太后允许曾布以如此“无礼”的方式来和自己交流,除了使曾布能清楚地聆听自己的言语,更向后者表明了自己视之为心腹的态度。交谈进行到这个程度,两人的关系有了大幅增进。一番长谈后,曾布确信向太后在此事上会支持自己,然最终还是需要获得十分明确的“圣旨”:

余又云:“适所进呈文字,取圣旨。”太母云:“这里也不争,却是他朝廷事体,既合改正须改正。”余遂退,三省于内东门伺候久之^①。

向氏十分清楚,按北宋惯例,诸如垂帘仪制这样的大事,并不能以某个宰辅和太后私下密谈的结果而定,而应得到君主与宰辅群体的一致认可。自己的“圣旨”,必定会被曾布在此后的“同呈”中宣示。因此,提前对“圣旨”做了有针对性的修饰:既以“不争”再度表现了她本人的“谦逊”,又借“朝廷事体”为由,规避了女主在此事上可能遭遇的尴尬,强化了将“同奏”改回为“覆奏”的正当性。

曾、向二人,都是谨言慎行的政治人物,徽宗即位之初复杂微妙的政治局势,更使二人不能不时刻有所顾忌。留身奏事的私密特性,给了二人畅所欲言的机会。经过这番密谈,曾布拿到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筹码,此外还获知了不少从其他渠道难以了解的政治信息,并强化了自己与向太后的政治联盟。他为了确保自己获得留身奏事机会而花费的一番心机,终于得到了回报。

四 御前“同呈”中的交锋

向氏的支持,使曾布有了底气。第二天(二月十三日)上午,曾布与三省长贰在御前同呈时就“覆奏”“同奏”一事又进行了讨论。

同呈“改覆奏事于皇太后”为“同奏事”。太常云:“门下相公指挥,及不当以福宁奏事为例。”余云:“未论事理是非,然改故事岂可不禀陛下及皇太后旨。”上顾余云:“皇太后圣旨云何?”余云:“太后云:‘这里也不争,然事干朝廷体,合改正须改正。’”上云:“须依故事。”余云:“三省、密院各有职事,未闻三省同呈密院文字,密院同呈三省文字。然此事臣等本不与议,又不曾奏稟,臣等皆罪人。”小凤(许将)云:“失于点检,只作熟事押过。”左辖亦云:“实失于详览。”夔云:“曾签书否?”余云:“适已奏,失于点检,皆是有罪之人。”左辖云:“章惇岂止此事不商量,于定宗庙社稷大计,亦不与众人商量便启口。”众莫敢对。上云:“依故事改正。”^②

经过一番辩难,分班“覆奏”之制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确认。此后,两府赴内东门小殿面奏太后,“再对覆奏事,余更不欲喋喋,但略陈改正而已”^③。曾布最终压倒了章惇,反败为胜。

曾布能在“同呈”中击败章惇,与二人的表现有直接关系。当日曾布的发言相当有针对性:一开始,他便举出太常寺的回文和向太后的圣旨,从法理层面彻底否定了章惇的做法,使自己在博弈中获得了明显优势。此后,他又对三省长贰进行了巧妙的离间分化,用“臣等本不与议,又不曾奏稟,臣等皆罪人”这一看似自责的言语,为在“同奏”文书上“签书”的许将、蔡卞提供了一个推卸连带责任的借口,令他们可以主动地与章惇“切割”开来,从而避免了自己与三省全体宰辅为敌。

反观章惇,在曾布取索太常寺文字时,已对曾布的意图有所察觉,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在“同呈”中,面对对手的步步紧逼,章惇显得手足无措。他对曾布的回击,仅仅是反问“曾签书否”。在曾布等人已表示“不与议”、“失于详览”的情况下,这一回击的力度明显不足。此外,许、蔡的倒戈相向,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但也说明章惇在上殿前没有对三省同僚进行过有效拉拢。可以想见,章惇在“同呈”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情况会变得对他如此不利,也未做相应的筹划。曾布曾说章惇虽“多计数”但“谋事疏率”^④,以此事观之,可谓知人之言。

许将、蔡卞二人对奏对结果也有影响。当日二人有两次发言。第一次是在曾布说完“然此事臣等本不与议,又不曾奏稟,臣等皆罪人”后,两人立即称自己“失于点检”“失于详览”。两人的这番话,表面上是自责,实际是撇清了他们在此事上与章惇的关系,宣示自己并非章惇的同盟,使章惇陷入了

①②③④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47~248、249、250、215页。

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在许、蔡表示“失于详览”后,章惇仍在抗辩,说明两人的这番言语对其打击尚不致命。第二次是在曾布与章惇就“签书否”进行争辩之后,蔡卞称:“章惇岂止此事不商量,于定宗庙社稷大计,亦不与众人商量便启口。”此话一出,立即使众人“莫敢对”,用事后徽宗的话说,它使“惇全无颜色”^①,对于章惇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章惇既然不敢再做争辩,徽宗和曾布将“同奏”改回为“覆奏”也就再无困难。可以说,蔡卞此语,在当日“同呈”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许将素来畏惧章惇,“同呈”时却不对章惇施以援手,这看似奇怪,实则不难理解:当曾布宣示向太后“合改正须改正”的圣旨以及徽宗表示“须依故事”之后,若再支持章惇,就是公然与君主对抗。在“同呈”中,曾布已经证明章惇确有弄权之举,许将若不及时与章惇进行“切割”,他本人也有可能遭受攻讦。此外,许将对章惇虽然畏惧,却不亲附,早在哲宗朝,就曾私下表示过对章惇某些行为的不满^②。当情势已经对章惇不利时,他自然不会冒风险去对后者加以援助。

蔡卞对章惇的攻击,颇有些出人意料。当天的枢密院“再对”中,徽宗特意对曾布提及“蔡卞便如此说”,“盖言其斥惇定策事”^③。“定策”一事的敏感性之高,不问可知。徽宗即位之初,君臣在公开场合往往有意回避这一话题。而且,在众人面前如此言说,必然招来章惇的无比怨恨,会使得双方关系难有转圜的余地。即便是真有定策之功且与章惇矛盾尖锐的曾布,也向徽宗坦言,此事“臣本不敢言”^④。蔡卞极有城府,纵然心中有所图谋,也多是借助他人之力,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施行,以致时人有“谋发于蔡卞之心,事成于章惇之手”^⑤之说。对比他既往的行事风格,当日他关于“定策”的发言的确十分反常。对此曾布的评述是:“卞本与惇为死党,今相失,故讦扬如此。”^⑥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显得笼统。蔡、章在哲宗朝便已经“猜贰”,然当时的奏对中,两人只是“议论之际,互相观望,莫肯启口”^⑦,罕见公开激烈的攻讦。为何在徽宗面前,蔡卞却“讦扬如此”?

徽宗即位之后,身为宰辅的蔡卞,若想巩固乃至扩大自己的权势,势必需要赢得新君的倚信。但他与新君之间的关系基础相当薄弱。与曾布类似,蔡卞与徽宗、向太后在此前无甚渊源。向太后与宰辅商议新帝人选时,蔡卞虽称“在皇太后圣旨”,但在当时,这更多的是一种顺水推舟式的表态,对向太后和徽宗所给予的帮助,远不如公开斥责章惇的曾布有力^⑧。不仅如此,蔡卞曾一度与章惇关系近密,后虽有隙,但章、蔡为“死党”的看法早已深入人心,徽宗和向太后难免不会因此而对蔡卞侧目。若要重新营造自己在君主心中的形象,蔡卞便不能不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选择他人皆不敢言的定策事向章惇发难,便是蔡卞向君主表明自己立场的方式。

又如前述,蔡卞与曾布、章惇均有矛盾。在政见方面,蔡、曾分歧巨大,难以弥合。而在仕进方面,与蔡卞同在三省且独霸相位数年之久的章惇,无疑是蔡卞一大障碍。哲宗亲政期间,章惇地位难以撼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当时曾于帘前议立先帝(哲宗)”。哲宗死后,章惇图谋定策失败,客观上给蔡卞提供了借势将其击垮的机会。而在可以用于攻击章惇的话题中,定策无疑又是最具杀伤力的一个。

重提定策,应是蔡卞的策略性行为,而非一时意气用事。选择在“同呈”这一场合重提此事,也应是他谋定后动的结果。在北宋政治生活中,两府同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朝野上下对此都十分关注。同时,由于两府同呈参与者众多,以及被安排在前殿视朝这一相对公开的朝会活动中,故其间发生之事往往不胫而走,在朝堂内外迅速传开。如此一来,蔡卞借助此事的传布,既可以在朝野间强化自己不党附章惇的形象,又可放大对章惇的打击效应。数日后,蔡卞又在同呈中“面斥其(章惇)语”^⑨,这也表明二月十三日“同呈”中他对章惇的抨击并非偶然。曾、章在“同呈”中的争辩,恰为蔡卞提供了借题发挥、攻讦章惇的机会。反过来,蔡卞对章惇的攻讦,又使得曾布有所获益。北宋两府“同呈”之微

①③④⑥⑨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第251、250、251、251、253页。

② 参见方诚峰:《走出新旧: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142~143页。

⑤ 佚名撰,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一四,元符三年四月丁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辛亥,第11765页。

⑧ 参见张邦炜:《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32页。

妙,于此可见一斑。

“同呈”的结果,与宰辅间的勾心斗角存在密切关系。那么徽宗在“同呈”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当日徽宗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对分班“覆奏”的支持,然而他“须依故事”的发言,并未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随后发生的争论,徽宗亦无法介入。一直到曾布、蔡卞令章惇彻底哑口无言之后,徽宗“依故事改正”的圣旨才真正得到了确认。这位少年新帝个人威望和经验的不足再次显现。面对章惇这样的资深宰相,徽宗在运用权力时尚不太得心应手。

仅仅看“同呈”中徽宗个人的表现,似乎可以认为当时皇权势弱。但结合其他相关情况,我们又会发现,“同呈”仍处于皇权笼罩之下。如前文所述,曾布之所以敢于在“同呈”中向章惇叫阵、许将之所以不支持章惇、蔡卞之所以公开指责章惇,个中缘由虽然复杂,但与向太后和徽宗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蔡卞“斥惇定策事”,可以立即使“惇全无颜色”,则说明章惇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因定策失败而与皇权走向决裂充满惶恐。徽宗一时虽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北宋稳固的皇权体制,以及一切权力均源自皇权的政治结构,并没有遭到根本改变。从长远来看,政治的主导权早晚会回到君主手中。对于这一点,宰辅们都十分清楚,即使面对徽宗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君主,皇权也依然会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言行。

综上,“同呈”的结果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这一结果在政治上的影响,亦远不止于确定了覆奏班次。章惇继定策事后再遭沉重挫折,气势大减。徽宗、向太后和曾布既成功打压了政敌,更借助分班覆奏之制在外廷与禁中之间建立起一条稳固的私密沟通渠道。此后,曾布屡屡于帘前“覆奏”之时,给向太后献计献策,为帝后巩固权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助力^①。经此一事,权力博弈的天平愈发明显地向着徽宗、向太后、曾布一方倾斜了。君臣交流,不仅事关信息传递和决策制定,更直接关系到各方势力的消长和政局的走势,“覆奏”“同奏”之争,可算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五 结 语

徽宗即位之初的“覆奏”“同奏”之争,以帘前覆奏班次为主题,凸显了奏对活动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此次政争,涉及两府分班奏事、两府合班奏事、留身奏事、进熟状等奏事方式,可算是北宋多元化君臣交流渠道的集中展示。因此,此事虽只是一个个例,却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宋代的君臣沟通。

在几次奏对中,处处可见人、制度、政治形势三种因素的互动。特定的政治形势,使某些人可以在看似公平的制度框架内获得更大利益。政治形势会促使政治人物对制度加以调整,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他们在调整制度时所使用的策略,往往又是基于相应的形势而制定的。最终政治形势的演变,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人物与制度的互相影响,以及制度框架内不同政治人物彼此关系的变化。对于三者的复杂关联,宋代政治史的既有研究关注得不多,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

“覆奏”“同奏”之争,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北宋皇权体制。在以往的讨论中,关于宋代皇权与相权孰强孰弱,学者们的看法往往针锋相对。此事则提示我们,个人层面的君主、宰辅关系,与体制层面的皇权、相权关系,既有关联,亦有参差。君主本人受种种因素的制约,未必能将体制赋予自己的权力充分发挥出来,在实际运作中,其影响力有时尚不及宰辅。即位之初的徽宗,即是显例。然不论君主与宰辅的个人关系如何变化,皇权体制这一刚性框架始终不会被突破。看似强横的章惇,最终难逃失败,就是最好的注脚。讨论皇权强弱时,必须同时照顾到上述两个层面,才能避免偏颇。

事实上,皇权、相权的强弱皆非孤立事物。宰辅需要皇权的支持,皇权之发动,也需与宰辅中的政治势力结合。曾布势力本弱于章惇,却因得到徽宗、向太后的帮助,最终反败为胜。徽宗即位之初,拥有的更多的是象征性皇权,向太后所掌握的实际皇权在当时亦颇受掣肘。然两人与曾布结盟后,便能冲破权相章惇的阻挠,顺利实现自己的意愿。君主与宰辅,虽然存在矛盾冲突,但究其根本,是彼此互

^① 参见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42~258页。

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相比备受关注的君相之争,皇权与相权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形成“组合”,更值得重视。

收稿日期 2014-09-22

作者王化雨,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A Study of the Disputes over *fu zhou* and *tong zhou* in Early Song Huizong Time

Wang Huayu

Key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Huizong; prime ministers; memorial-presentation; imperial power

Abstract: When Song Hui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empress Xiang attended to state affairs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Zeng Bu and Zhang Dun disagreed on how to present a report. In order to talk secretly with empress Xiang, Zeng Bu preferred to present a report in different panels. While Zhang Dun preferred in the same panel. To achieve their personal purposes, they adopted multiple kinds of reporting. Finally, due to the complex factors, Zeng Bu won. Through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mperor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stat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mperial power system. In addition, it reminds u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in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power and minister power in system level are relevant and different. There are both conflicts and complementary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Compared with their conflict, how did they combine together in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is more worthy to study.

【责任编辑 惟 正】